

中国历史

辽史

李锡厚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

辽史

李锡厚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史 / 李锡厚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中国历史·辽史 / 张秀平 关宏策划)

ISBN 7-01-004928-9

I. 辽... II. 李... III. 中国—古代史—辽代 IV. K246.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009 号

辽 史

作 者: 李锡厚

选题策划: 张秀平 关 宏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 晖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出版日期: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5.875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书号: ISBN 7-01-004928-9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论 辽朝的历史地位与辽史研究	1
第一章 契丹兴起与辽朝建立	19
第一节 从库莫奚到契丹八部联盟.....	19
第二节 阿保机夺取汗位及称帝.....	28
第三节 契丹汗国疆域的扩大.....	38
第四节 灭亡后晋的战争.....	60
第五节 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72
第二章 辽朝的兴盛	86
第一节 穆宗继位与停止南伐.....	86
第二节 中期的政治稳定.....	93
第三节 兴宗与法天太后.....	124
第四节 边防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134
第三章 辽中期的政治制度	155
第一节 朝廷.....	155
第二节 官制.....	166
第三节 蕃汉分治的法律制度.....	198
第四章 辽朝的衰亡	206
第一节 道宗时期的社会危机.....	206
第二节 天祚嗣立与女真兴起.....	217
第三节 阿骨打起兵与天祚帝被俘.....	226
第四节 大辽国统的延续——西辽.....	247
第五章 社会经济结构	257
第一节 燕云地区的土地私有制.....	257
第二节 塞外的头下制度.....	265
第三节 诸宫卫.....	299
第四节 寺院经济.....	315

第六章 重要经济领域	321
第一节 农牧业.....	321
第二节 手工业.....	328
第三节 城市.....	339
第四节 商业.....	346
第五节 钱币和工商税.....	351
第七章 文化及社会生活	355
第一节 科技 学术 教育.....	355
第二节 艺术 文学.....	359
第三节 宗教信仰.....	365
第四节 衣食住行.....	369
征引文献目录	382
索引(按笔画为序)	
(人名、地名、重大事件及典章制度)	391

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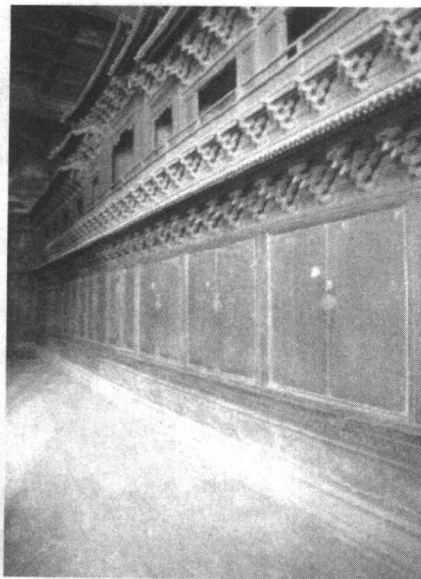
辽朝的历史地位与辽史研究

一、中国历史上的辽朝

公元10—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贵族作为统治集团主体建立的辽王朝，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族自北魏始见于史籍记载。唐帝国衰落之后，契丹汗国兴起，于是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塞北各族再一次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辽还占有幽蓟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论及辽朝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¹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后来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今山西地区归入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局面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无论是魏晋之后的南北朝还是辽宋分立时期，南北双方都以“正统”自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



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
藏殿内壁藏

¹ 《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第1辑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 7 号
辽墓出土的竹雀双兔图

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分立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辽这个先于北宋立国、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的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当后汉政权建立、他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徒弃山河,不少顾虑”。¹于是,据说是秦汉以来帝王的法物尽入于辽。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宋仁宗遣使至辽,曾见辽帝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²辽朝用历代帝王法物装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代表“正统”。“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³“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⁴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⁵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除了相似之处,当然也还有很多不同之点。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分立时期,由于南北双方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则达到相互承认。辽景宗保宁六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尝不世载欢盟、时通货币?”⁶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与宋就成了“兄弟之邦”。

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伴随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也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

¹ 《辽史》卷 58《仪卫志》。

² 《珣璜新论》。

³ 《东坡应诏集》卷 5《策断》。

⁴ 《苏魏公文集》卷 66《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⁵ 《圣宗皇帝哀册》,《全辽文》第 141 页。

⁶ 《宋朝事实》卷 20《经略幽蓟》。

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为安置汉族流民,塞外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所谓“汉城”和“头下军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逐渐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中原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并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历史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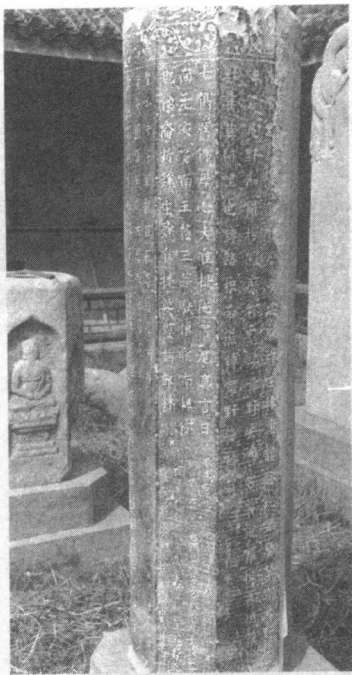


描写契丹族狩猎生活片断的卓歌图

二、《辽史》纂修的经过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当时还没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会同四年(941年)二月,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¹这当视为辽朝纂修皇室先世历史之始。不过,契丹本无文字,直至阿保机即位后,始创制契丹文字。因此,关于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只能是得自传说,并无文献依据。辽朝真正有官方编纂的本朝历史,实际上是始于圣宗时期。这一点,现存的元修《辽史》有所反映。《辽史》有本纪30卷,太祖到景宗五帝享国77年(907—983年),只占10卷。然而,圣宗一朝51年,却占8卷,而且篇幅则与辽初五帝的本纪几乎相等。此无他,皆因为辽初并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当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景宗乾

¹ 《辽史》卷4《太宗本纪》。



现存北京顺义区文物管理所的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立于辽乾统五年（1105年）

亨初，汉臣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南宰相，监修国史。至统和八年（990年），他“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¹这20卷《实录》的内容，当包括了辽初五帝时期的史事。至兴宗时期，又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²辽朝这两次修《实录》，都是追记辽初史事。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史臣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的实录。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70卷。³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耶律俨字若思，析津（北京市）人，本姓李。咸雍进士。道宗寿昌间，官至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俨深受道宗信任，道宗弥留之际，俨曾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正因为耶律俨在辽朝地位显赫，而且与契丹皇室关系密切，再加上他有文才，所以成为辽朝实录的编纂者。金灭辽后，耶律俨的《辽朝实录》稿本归金朝廷。《金史》卷4《熙宗本纪》于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记载，熙宗“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这里所记金熙宗读的《辽史》，当即是耶律俨的《辽朝实录》。上引《熙宗本纪》于皇统八年（1148年）又记载“《辽史》成”。则是金初纂修的《辽史》。表明金熙宗不仅读辽朝留下的史书，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曾纂修《辽史》。此事先由广宁尹耶律固承担。未及成书，耶律固先亡，于是又由其门人萧永祺续成。耶律固与萧永祺都是契丹人，当时距辽亡不久，他们可能都通契丹文字。因此，他们修《辽史》不仅使用汉文文献，当时能见到的契丹文的文献，也一定都会加以利用的。这部《辽史》有纪30卷，志5卷和传40卷，纪、传卷数与今本元修《辽史》相同。书成后，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先后有移刺履、贾铉、党怀英及萧贡等人参与刊修，至泰和七年（1207年）由陈大任完成，但亦未刊行。熙宗和章宗时期两度纂修《辽史》都未刊行，其原因多半是与辽末女真兴起的一段史事有关。女真原为辽朝属部，《金史》记载其初兴历史，多讳言其原本隶属于辽。因此，如何处理这段史事，金人是颇费斟酌的。

¹ 《辽史》卷79《室昉传》。

²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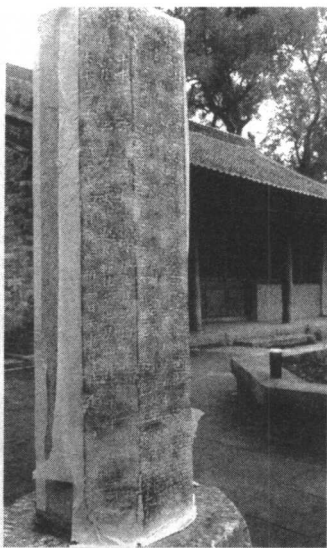
³ 《辽史》卷98《耶律俨传》。

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说:“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¹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²且都是宋人留下的。

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据苏天爵说:“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龕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金章宗初年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³既然天历间(1328—1330年)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那么至正初年修辽史,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两度议修《辽史》和《金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宋史》。作为《辽史》总裁官之一的欧阳玄在《进辽史表》中曾这样提及此事:“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加愍恻,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余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⁴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始终未能修成宋、辽、金三史。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又诏儒臣分撰《辽史》,这一次,仅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至次年三月,《辽史》即草告成。

如果从中统二年元朝开始筹划修《辽史》算起,直到最后成书,前后历时已达80余年。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则是更大的难题。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1329年)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



位于北京怀柔区杨宋镇凤翔寺内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建于辽太平二年(1022年)

¹ 《元文类》卷51《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² 《清容居士集》卷41。

³ 《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

⁴ 《圭斋文集》卷13。



位于北京房山区张坊村的
忏悔正慧大师遗行塔，始建
于辽天庆六年（1116年）

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此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¹这位曾参与修《辽史》并出任总裁官的揭傒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被视为“正统”。

元朝统治者虽然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纂修辽、宋、金三史，但他们的立场、观点却不可能与这些封建士大夫完全一致。元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蒙古族，与辽、金王朝统治集团的主体一样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因此，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对于元朝本身的正统地位也必有所动摇。不过，元朝本身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这一点与宋、辽、金三个王朝都不一样。他们最初是犹豫应当继承宋还是继承辽金的法统。由于利弊得失颇费斟酌，因此，直到元朝末年始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样，元末至正四年（1344年），《辽史》终于得以修成。

《辽史》是一部官修史书，由当时的宰相脱脱任都总裁，其下有总裁官，除前面提及的欧阳玄和揭傒斯之外，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及吕思诚等人，他们都是知名当世的文人。而实际担当纂修工作的，则是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和陈绎曾等四人，由他们担任纂修官。廉惠山海牙是畏兀儿人，至治进士，曾任顺州同知，泰定元年（1324年）入史馆。至正四年，预修宋、辽、金三史。契丹和回鹘有密切关系，阿保机之妻述律氏就是归化契丹的回鹘人，她的兄弟萧敌鲁及阿古只，都是阿保机的佐命功臣，分别被喻为阿保机的“手”和“耳”。回鹘文化高于契丹，在创制契丹文字之前，契丹也许曾经使用回鹘文字记事。因此，廉惠山海牙参与修《辽史》，对于理清辽朝早期史事及契丹与回鹘的关系，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王沂先世为云中（山西大同）人，后徙真定（河北正定），元祐初进士，其六世祖，仕辽为户部侍郎。²沂本人曾任嵩州同知，至顺三年（1332年）出任国史院编修官。而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书成之时，他在朝廷上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他被选中参与纂修《辽史》，可能与其

¹《揭文安公文集》卷8。

²《石田集》卷13《监黄池税务王君墓碣铭》。

先世仕于辽、因此熟悉辽朝史事有关。

三、《辽史》的主要内容及严重缺陷

元朝修辽、宋、金三史虽然确定了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但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绍兴山阴县人杨维桢,元泰定丁卯(四年,1327年)进士,至正初,诏征天下儒臣修辽金宋三史,维桢不得预。史成,正统迄无定论,至正三年(1343年)维桢上表称:“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¹杨维桢的观点与担任《辽史》纂修总裁官的揭傒斯,如出一辙。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何况当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又残缺不全。赵汭在论及元朝纂修宋、辽、金三史时的资料条件时曾这样说:“理度世相近而典籍散亡,辽金传代久而记载残阙,欲措诸辞而不失者亦难矣哉。”²辽金文献残缺不全以及南宋末年传世典籍缺乏,都同样给元朝修史造成极大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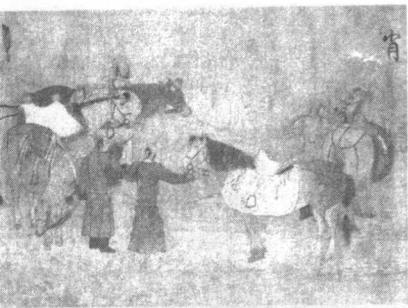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刻板印行,只印了100部,早已全部失传。元末和明初又有刊行,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辽史》,就是用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凑而成的影印本,虽有讹误,但仍优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刻本。例如明代北京和南京两地国子监的刻本——北监本和南监本,清武英殿刻本(“殿本”),总的说来都不如百衲本。殿本据四库全书本改译契丹人名、官名,更是给读者造成极大的不便。因此,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取百衲本为底本,与其他刻本参校,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果,同时还以本书的纪、志、表、传互校,再与其他史籍对校,是目前最便于使用的版本。



现存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内的
晚公大师塔,建于辽大安
九年(1093年)

¹ 《辍耕录》卷3《正统辨》。据《千顷堂书目》卷5,维桢书名《宋辽金正统辨》,1卷。《东维子集》原不载此篇,四库馆臣奉谕旨据《辍耕录》补入。

² 《东山存稿》卷5《题三史目录纪年后》。



描写契丹族狩猎生活片断的
卓歌图

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述耶律俨及陈大任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关于契丹历史的文献,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者,有《契丹官仪》、《契丹机宜通要》、《契丹事迹》、《燕京会要》、《契丹实录》、《契丹疆宇图》、《契丹朝献礼物例》、《契丹志》、《燕北录》、《庆历奉使录》、《匈奴须知》、《北志》、《契丹须知》、《张浮休使辽录》、赵志忠《阴山杂录》、《契丹会要》等¹,共16种。其中多数已佚,存者如《燕北录》,已残缺不全。《阴山杂录》又称《虏庭杂记》,只在他书中散见数条。但元朝修史时,这些书都还保存完好。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也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地理志》中关于州县建制及社会经济状况的资料,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辽史》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辽王朝统治下的人民,汉人占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辽史》有列传45卷,正式立传者包括240人,而耶律和萧氏合起来就有180多人。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又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如卷76《张砺传》就是如此。此外,卷74《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¹《说郛》(宛)卷10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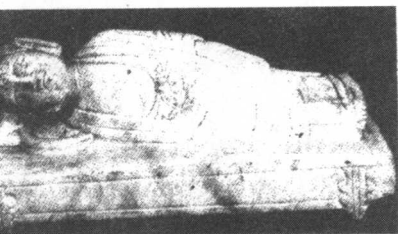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记载辽朝建立以前契丹史事的《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金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最要取材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¹因为修史时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幹,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类似这种混乱情况,不独辽末为然。《辽史》卷16《圣宗本纪》开泰七年(1018年)十一月壬戌记载:“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其实,刘晟即刘慎行,彰武军亦即霸州。此为小事重出。此外,契丹人名、地名的异译被误为二人、二地的情况就更为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元修《辽史》主要是因袭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旧稿草率成书,同时又兼采南朝记录。不同时代,再加上五代、宋人记辽事所用人名、地名多与前述二家辽史不同,编纂者不加核对,而是兼收并蓄,于是同人异名,被误为二人二事的情况即多有发生。从这样一部残缺不全、混乱不堪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元修《辽史》对契丹王朝作为“行国”的制度不甚了了。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在冬、夏捺钵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国政;在春捺钵钓鱼、在秋捺钵围猎,与各部族首领加强联系。这都是契丹王朝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辽史》在本纪中记载某月某日“如春水”,某月某日“清暑永安山”等等,实际上是表明编纂者并不了解辽朝皇帝一年四季都活动于四时捺钵。本纪之外又有《游幸表》记载此事,更误以为四时捺钵是“游幸”。《四年版。



描写契丹族狩猎生活片断的
卓歇图

¹ 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59—16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房山北郑村辽塔塔基出土的石卧佛

库提要》以为《辽史》本纪与《游幸表》记事重复,其实,要害不在重复,而在于对四时捺钵地位的误解。

四、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内容进行订补。早年,治辽史最有成绩者,当数厉鹗。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年)举人,作有《辽史拾遗》24卷。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358种,¹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都补充了大量史料,仿陈寿注《三国志》的办法,有注有补,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征引他书条列于下。成书后,初刻于乾隆八年(1743年)。虽然该书引用的典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杨复吉又有《辽史拾遗补》5卷刊行,但较厉鹗书已大为逊色。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等人也都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工夫。

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成为时尚,“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²史学大师王国维关于契丹及辽代史事的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继承并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用“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辽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所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³以中国历代史籍与中亚史籍相参证,证明虎思斡耳朵即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中的八喇沙衮。并且辨明虎思斡耳朵为契丹新名,其名行于东方;而八喇沙衮则为突厥旧名,即《唐书·地理志》之“裴罗将军城”。同时,他还证明二者方位一致,在

¹ 据柴德赓先生统计,见《史籍举要》第140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² 《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辰》。

³ 《观堂集林》卷14。

吹河(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楚河)之南岸。他的另一论著《靺鞨考》,¹则是以汉籍与少数民族文献相参证,首先探明靺鞨之名何时见于突厥文献及汉籍。他考察的结论是:“靺鞨之名始见于唐之中叶阙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靺鞨 Totuz Tatar,九姓靺鞨 Tokuz Tatar,是为靺鞨初见记录之始。案阙特勤碑立于开元二十年,则靺鞨之名古矣。”靺鞨之名初见于汉籍,则始于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该书卷5有《赐回鹘唃没斯特勒等诏书》,其中提到“达旦”;卷8《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也提到“达怛”。时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较突厥文献提及靺鞨,晚了110年。后来靺鞨与辽金都有密切关系,然而《辽史》中仅三见“达旦”之名,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王国维发现“唐宋间之靺鞨,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鞑,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他以《辽史》中靺鞨未尽改称阻卜之例,与已改者为同一事,证明阻卜实即靺鞨。再以《长编》所记齐妃西捍塔鞑与《辽史·圣宗本纪》及《萧达凛传》所记统和十二年、十五年之讨阻卜亦为同一事,从而解决了《辽史》中一再出现的“阻卜”究竟是什么民族的问题。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

(一) 经陈汉章、冯家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可读之书。诸家校勘成果曾分别著书刊行,今已为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所吸收。

(二) 由于金毓黻、罗福颐、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金毓黻的《辽陵石刻集录》、罗福颐的《满洲金石志》和陈述的《全辽文》,都竭尽全力搜集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碑刻文字,并加以考释。近年向南又有《辽代石刻文编》,收辽代石刻文字,多达320多篇,其中有许多是近年新出土而以前诸家未曾著录的。

(三) 辽、宋并立160多年,双方聘使不断,构成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张亮采和傅乐焕曾致力于宋辽交聘史事的研究。张有《补辽史交聘表》5卷,东北文献¹《观堂集林》卷14。



河北宣化县辽张世卿墓壁
画散乐图



现存北京大兴区黄村火神庙
的大康二年幢，建于辽大康
二年（1080年）

丛书本，1943年印行。傅作《宋辽聘使表稿》（载《辽史丛考》），开始更在张从事此项工作之前。《辽史》没有艺文志，在辑校辽代遗文的同时，缪荃孙为《辽史》作了《艺文志》，王仁俊、黄任恒等人，又作《辽史艺文志补正》和《补辽史艺文志》。后都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谭其骧有《辽史地理志补正》，载《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吴廷燮有《辽方镇年表》，辽海丛书本，1931—1934年印行。近年，蔡美彪、冯永谦、向南、阎万章等，又根据新发现的辽代碑刻、墓志，对《辽史》的公主表、外戚表、皇族表等进行了补正。

（四）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傅乐焕（1913—1966年），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前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他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等论著中，揭示了捺钵在辽朝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指出辽的朝廷不在中京，而在捺钵，首次正确解读了《辽史·营卫志》。他的论著，中华书局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名为《辽史丛考》。姚从吾（1894—1970年），河南襄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初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辽史》及王鼎《焚椒录》所记载的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案，颇有新意。他的著作由其门人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陈述（1911—1992年），河北乐亭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述毕生从事辽金史研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他在辽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出版，修改后易名《契丹政治史稿》，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五）近年来，蔡美彪先生关于契丹史事、漆侠先生关于辽朝经济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关于辽朝政治、地理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蔡美彪等撰写的《中国通史》（第6册），在我国出版的同类著作中首次系统、详尽